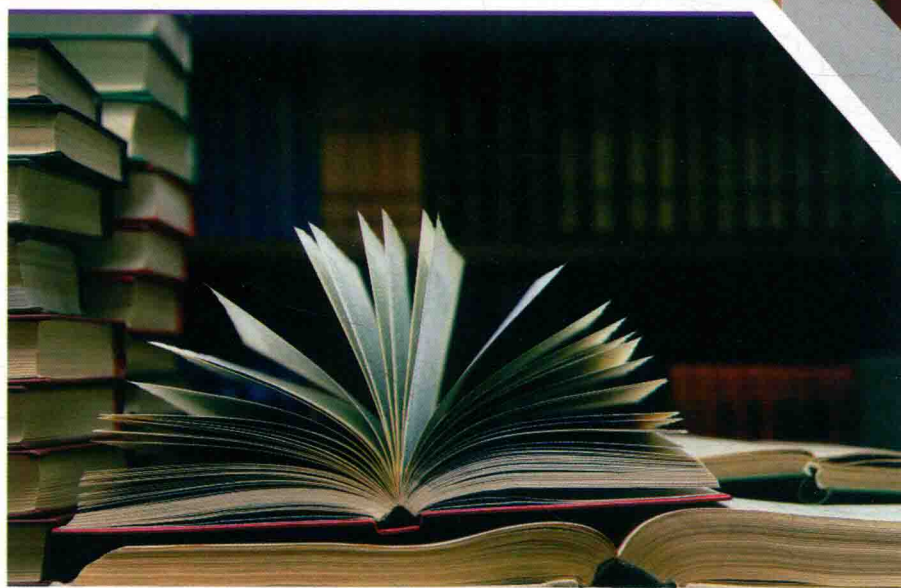



中国图书 情报知识图谱研究

夏丹 李娟 著



兼外借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图书 情报知识图谱研究

夏丹 李娟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图书情报知识图谱研究 / 夏丹, 李娟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692-2867-0

I. ①中… II. ①夏… ②李… III. ①图书情报工作—研究—中国 IV. ①G2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2297号

书 名: 中国图书情报知识图谱研究

ZHONGGUO TUSHU QINGBAO ZHISHI TUPU YANJIU

作 者: 夏 丹 李 娟 著

策划编辑: 邵宇彤

责任编辑: 代景丽

责任校对: 云 宇

装帧设计: 优盛文化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059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dcbs@jlu.edu.cn

印 刷: 定州启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92-2867-0

定 价: 55.00元



前言

图书情报学产生于现代信息技术形势下，它是图书馆业务学科与情报信息学科相结合的一门学科，该学科的专业课程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等。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使图书情报学发生改变，从图书情报学科诞生之日起，它就在历史的车轮中改革着。一个学科的研究是为了推进该学科的进步，研究图书情报学知识图谱也是如此。

近几年，众多学者热衷于图书情报知识图谱的研究工作。图书情报学产生于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不断扩展，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图书情报知识图谱借助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框架、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等方法把复杂的知识领域用图谱绘制出来，从而使人们用更直观的形式了解知识。

《中国图书情报知识图谱研究》一书首先提出研究背景、意义、发展历程、发展状态，然后从图书情报学、知识图谱两个概念阐述研究重点。本书详细研究了图书情报知识图谱的构建、绘制方法、绘制工具、数据采集和处理、CNKI数据库、CSSCI数据库，以及知识图谱在移动图书馆中的应用，最后总结此次研究，提出对未来图书情报知识学图谱的展望。作者希望借助此次研究，逐一列出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趋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与当前研究热点接轨，推动我国图书情报的发展。

| | | |
|-----|-------------------|------|
| 第一章 | 绪 论 | / 1 |
| 第一节 |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 |
| 第二节 | 中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 | / 8 |
| 第三节 | 中外图书情报学科知识图谱研究现状 | / 14 |
| 第四节 | 网络时代图书情报实践 | / 18 |
| 第二章 | 图书情报知识图谱理论概述 | / 21 |
| 第一节 | 知识图谱基础知识 | / 21 |
| 第二节 | 知识图谱绘制方法 | / 29 |
| 第三章 | 图书情报知识图谱的构建 | / 31 |
| 第一节 | 知识图谱构建过程 | / 31 |
| 第二节 | 知识图谱分析方式 | / 38 |
| 第四章 | 图书情报知识图谱的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4 |
| 第一节 | 图书情报学知识图谱的数据来源 | / 54 |
| 第二节 | 图书情报学研究文献知识图谱数据处理 | / 57 |
| 第三节 | 图书情报学知识图谱研究引文数据处理 | / 85 |
| 第五章 | 中国图书情报学科知识图谱的应用软件 | / 87 |
| 第一节 | 统计分析系列软件 | / 87 |
| 第二节 | 信息可视化系列软件 | / 89 |

| | | |
|------|------------------------|-------|
| 第六章 | 图书情报学科知识图谱在 CSSCI 中的研究 | / 98 |
| 第一节 | 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研究机构 | / 98 |
| 第二节 | CSSCI 中的数据来源与文献分析 | / 102 |
| 第三节 | CSSCI 中的知识图谱分析探索 | / 104 |
| 第七章 | 图书情报学科知识图谱在 CNKI 中的研究 | / 111 |
| 第一节 | CNKI 中的数据来源与数据分析工具 | / 111 |
| 第二节 | CNKI 中的知识图谱发展历程分析 | / 113 |
| 第八章 | 移动图书馆知识图谱研究 | / 163 |
| 第一节 | 移动图书馆概述 | / 163 |
| 第二节 | 移动图书馆知识图谱的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 | / 164 |
| 第三节 | 移动图书馆知识图谱核心期刊和作者分布 | / 166 |
| 第四节 | 中国移动图书馆发展建设策略 | / 168 |
| 第九章 | 图书情报学科研究展望 | / 186 |
| 第一节 |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 / 186 |
| 第二节 | 隐性知识与图书情报学理论创新 | / 188 |
| 第三节 | 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创新与实践研究 | / 192 |
| 第四节 | 网络信息中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和教育发展的战略 | / 198 |
| 参考文献 | | / 206 |

第一章 绪论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具有科学性的新文献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科学知识的更新换代日新月异,如何于迅速变化与发展的动态环境里把控知识领域发展、进步的结构、趋向与形式是目前科研人员普遍面临和亟待发掘的重要问题。图书情报学作为一门新出现的、与社会有极为紧密联系的学科,在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深化的新时代背景之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这表现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持续拓展,信息科学的热点和前沿层出不穷。图书情报学这门学科的学科结构和学科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丰富与完善。

第一节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图书情报学的含义

情报学是一门与情报信息有关的学科,目前都归结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也就是信息管理专业,主要是文献信息的组织、存储、检索、咨询、分析和读者服务等相关知识学科。图书情报学是指图书馆业务学科和情报信息学科相结合的一门学科。

经相关文献的统计数据可知,1987—2017年,我国图书情报学十九种核心期刊的发文数量和变化趋势呈波浪式起伏上升。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 1987—1994年,稳步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受我国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与影响,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曾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谷。1987—1991年,关于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发文量稳步增加,其分布趋向于一条直线。1992年,相关研究成果突破了两千篇,曲线发展较平稳。

2. 1998—2000年, 自动化时期: 在这五年里, 有关图书情报学的发文量不断攀升, 2000年达到了3423篇, 较1994年时增长了约42%, 且在这一阶段, 计算机逐渐应用到图书馆中, 对传统的图书情报学技术进行了重新洗牌。因此, 这时中国较大范围的图书情报机构都实行了自动化管理, 同时创建了许多大型的文献数据库, 图书情报学的相关研究也到了全面革新的时期。

3. 2001—2005年, 网络化时期: 在这一时期, 有关图书情报学的发文量的曲线更加陡峭, 2005年研究成果突破了5000, 与2000年相比, 发文数量同比增长49%。网络的普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等教育的极大进步, 几乎彻底使我国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图书情报事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 更多的研究者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

4. 2006—2017年, 快速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 图书情报学的发文量增加迅速并即将突破一万大关。随着文献信息服务方式和知识载体的多元化趋向的凸显, 知识的传播方式与途径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多样和复杂。网络环境从源头上对我国图书情报事业产生影响, 并从根本上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图书情报学知识图谱的研究背景

图书情报学是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结合组成的一门学科, 在现实领域中图书与情报密不可分, 虽行政归属相离, 但是在业务上存在诸多共性。20世纪80年代, 出现了将图书与情报一体化的思想。1953年, 荷兰的J.E.L.Farradance首先提出了“图书情报学家”(Information Scientist)这一专有名词。1995年时, “图书情报学家”(Information Scientist)在他的建议下, 作为学科名称并首次被研究者使用, 与此同时, 在其他国家, 很多研究者和相关院校也常把“Library Science”和“Information Science”组合起来, 变为“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S)”一词。

(一) 研究图书情报的原因

21世纪以来, 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信息时代,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 数字化信息呈现爆炸性增长, 面对如此之多的与数字信息相关的资源,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范围在慢慢地、逐步地产生变动。由以往几十年图书情报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与科研成果可知, 此学科虽然对社会发展做出过极大贡献, 但传统意义上的图书情报理论与图书情报实践已基本无法适应信息时代、数字化时代的进步需求。国际图联(IFLA)主席Anna Maria Tammaro提到, 图书情报学会随着教育、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科技环境的改变而形成极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研究图书情报知识图谱应将以下几点作为基础。

1. 我国图书情报学地位亟待提高

一门学科其在学术上是否有一席之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此学科对学术研究相关理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程度、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及解决在社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能力。前段时间,有关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在社会中激起了广泛而又热烈的探讨,许多研究者的观点是,图书情报这门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存在话语权缺失问题,这门学科也未能得到应有地位。例如,在整个学术界高精尖的学术团体中,图书情报学的学者寥寥无几,存在感低。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只有通过图书情报学发展的研究来将学科的发展境遇、研究热门问题、主题演化规则、发展存在的弊病进行再梳理,才能将图书情报学的体系更加完善,并提高这一学科在整个学术圈的地位。

2. 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快速发展急需建立新研究框架

我国的图书情报学随着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将研究的重点从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分析、图书馆服务与管理等研究领域渐渐向网络信息资源管理与检索、信息共享、数字图书馆、数据挖掘、本体语义网、知识管理与组织、科学计量学、竞争情报等研究领域转移,当今社会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前景变得模糊不清。

同时,图书情报学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两个二级学科的组合,随着学术视域的逐步拓展,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围与其他学科存在较大的交叉,在“信息计量”这一领域就包含管理学、计算机技术、数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所以在将来的研究里,各位研究者需维持学科研究的包容性、开放性,对学科“户口”性质加以突破,只有做到这些,研究者才能产生具有极大创新性和较大影响力的有关成果。学科研究范围的变动与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要求学者对图书情报学进行重新梳理与归类,同时还要对学科间的特征做进一步的了解与研究,并把握好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发展及存在的规律。

3. 建设创新型国家急需图书情报学理论的支撑

建设创新型国家急需图书情报学理论的支撑。我国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图书情报学的学术研究与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教兴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有着密切联系。我们国家对图书情报学有极大的社会需求,该学科的研究尚存较大的发展空间,增强图书情报学学研能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刻不容缓,图书情报学应为快速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应有贡献。

（二）学者的研究是图书情报学的基石

我国学者通过查阅文献、专家及问卷调查等途径，采用定性描述与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情报学发展历程、发展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研究者赖茂生对情报学在数字时代的应用前景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情报学在哲学的研究、基本理论的发展趋势和学科新核心话语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突破。此外，毕强还对数字时代的情报学发展趋向进行了展望，他认为数字时代情报学发展应该重视前沿发展和外延输出、学科核心话语知识化、技术与人文的协调统一几个方面。赖茂生利用问卷总结出竞争情报、知识管理等二十三个情报学前沿领域。经过调查，他还提出了十个具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其中有知识组织、情报检索、数字图书馆等。除赖茂生外，王益明等人还对我国情报学 2017 年在信息检索、情报分析和研究、信息服务、用户研究和信息计量学等五个重要领域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进步之处进行了一个综述性的概括总结。

传统意义上的定性研究需要攫取几乎所有的文献及研究成果，耗费心力的工作也会与主观判断相混淆。此法类似于“盲人摸象”，不能明晰学科发展的重点，也适应不了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学科结构。在知识和信息中，能够直观地展示学科发展的全貌以及处于发展前端的领域是很困难的。传统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对信息计量的把控较准确，但其直观性和生动性有所缺失。其实，直观地揭示整体的知识结构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更加客观、科学、高效的研究学科结构和发展的新方法。信息可视化理论、引文分析理论、复杂网络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成熟为找到新方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

奠定了科学知识图谱首块基石的是加菲尔德、普赖斯的引文分析理论。1964 年加菲尔德等人在《应用引文数据撰写科学历史》中开始了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他们画出了以时间为基础的 DNA 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图谱，这是基于引文的可视化图谱研究中的开辟性研究。1965 年，学者普赖斯用与加菲尔德等人相同的数据完成了他的论著《科学论文网络》。自此，以引文分析为基础的“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生发出来。1973 年，斯莫尔开创性地提出了“共被引”的概念和共被引的分析方式，此后斯莫尔和格里菲斯等研究者又提出了双引多引、期刊共被引、作者共被引等多种有关共被引的分析方式。1978 年，雷迭斯多夫总结并深入研究了绘制科学图谱的多个方法，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怀特和麦肯等学者则在共被引分析的基础上，将共被引分析与多种多元统计分析相结合，建立了以多维尺度分析为基础的知识图谱方法。

奠定了第二块基石的是统计物理学关于复杂网络系统的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的兴起以及统计物理学在引文网络中的应用，关于复杂网络系统的理论与运用方面的研究已被推到了自然与社会科学大交叉的前沿。1989年，哈蒙将社会网络分析法引到引文网络领域，还提出了引文网络中的关键路径算法，这使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水平“更上一层楼”，达到更高的境界。

将信息可视化的振兴与信息可视化在引文网络分析之中的运用作为科学知识图谱发展的第三块基石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80年代，信息可视化技术取得极大发展，将人机交互、数据挖掘、图像技术、认知科学等诸多学科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逐步变成了现代信息技术最前端的极受欢迎的领域。在信息可视化的振兴中，信息可视化研究的新领域的开拓者一个个浮现出来，在诸多开拓者中，美籍华裔学者陈超美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科学前沿图谱：知识可视化探索》和《信息可视化：超越时空》两部著作在现今这一大潮中具有重要地位。陈超美开发的“Cite Space”将信息可视化技术和科学计量学进行组合，创新性地研究出适合复杂网络分析的第二代信息可视化技术。他还开辟了以知识领域为分析单元的可视化综合性学术与应用领域，把相关研究推进到以知识图谱与知识可视化为辅导决策重要手段的一个新时期。

科学知识图谱随着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的进步变得愈发成熟，并因此被多个科学领域研究广泛运用，科学知识图谱研究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被更多学者接纳和使用。利用可视化知识图谱能够将学科的核心框架、发展历史、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展现得更加清晰，还能够将复杂的知识领域利用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展现，由此可以使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变得更易分析，为图书情报学的钻研提供符合实际、有所裨益的参考。

尽管在图书情报学的很多领域中，知识图谱都得到了成功应用，但它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弊端。

1. 研究范围较窄

目前知识图谱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研究范围还不够全面，多涉及某一方向或主题而未扩及整个学科。

2. 研究数据不够全面、规范、权威

数据研究选择一种或几种期刊、数据来源是未经规范化标引的数据库、一些数据研究不参考国外期刊导致了研究数据不全面、不够科学、缺少权威性。

3. 构建流程和方法不够规范系统

目前各领域专家对知识图谱的建构方法和构建流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例如，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构建出知识图谱发展历程，用经验主义和科学统计方法的流程来对知识图谱进行建构。这是因为学术界还未能对这两方面形成统一完善的体系。

三、图书情报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意义

科学知识图谱应用广泛，能够使人们的知识体系更加结构化，帮助人们梳理当下信息爆炸时代的知识脉络，实现对未来科技热点的预测功能。在科技方面，它已经成为追踪科技前沿、选择科研方向、开展知识管理与辅助科技决策不可或缺的工具。此外，科学知识图谱在学术共同体及其网络的研究、学科领域的发展及演进、研究课题的扩散与传播、作者或机构的关系等方面也发挥着作用与价值。

对于预测学科发展态势、实时监控学科变化方面，Small 和陈超美提出了各自的看法。Small 认为，新的网络分析工具可以实现知识可视化直接进行监控。陈超美认为，要预测学科发展可以通过寻找“研究前沿”“知识基础”与时间的关系来完成，即借助 Citespace 用研究前沿术语的共现、研究前沿术语引用知识基础随时间演变的情况搜寻研究热点和趋势。

知识图谱作为一种知识管理方法，需要利用信息可视化技术以及计算机程序将学科、文献或数据以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让人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完成对这个学科的结构分析，了解其如何兴起、通过何种渠道演进、呈现出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等。

随着科技的日益革新、信息量的日益剧增，与社会紧密联系、与不同学科交叉的情报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不断表现出新的特点和变化。为了明晰情报学当下的发展，掌握其未来研究的发展动向和情况，追踪该领域的热点和前沿是研究学者们的重要方向。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现状与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尤其对图书情报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重点具有重要意义。对其研究意义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1. 知识图谱研究是挖掘一个学科发展规律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它并不局限于对众多理论、学派的阐述，而是透过重重理论展现其主题和内在逻辑，帮助人们了解图书情报学演化路径、探究其主要内容、把握其内在规律。这不仅有效推动

了该学科的发展,还提高了高校图书情报学的建设能力,有利于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建设完善。

2. 要了解目前我国图书情报学的不足和局限性,为其长远发展谋求生路。要利用信息可视化技术对该学科的发展特征进行研究,挖掘其发展路径中存在的绊脚石,分析其发展道路上的弊端,从而确立科学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3. 有利于学者展开新的研究选题,扩展学科研发新方向。研究图书情报学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不仅使其研究内容得到延伸,还帮助研发人员发现被忽略的“子学科”、挖掘出潜在的新“子学科”。这对正确掌握该学科未来发展前景、推动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一门学科要想长久立足,不被时代抛弃,就要学会创新。图书情报学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改革创新、提高自我能力、加强竞争优势,才能在众多学科中站稳脚跟。图书情报学作为一门元老级学科,能够延续至今、生机勃勃,正是因为该学科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不忘关注前沿和热点研究、积极创新理论,保持学科优势和特色。

5. 图书情报学需要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监测,预测其发展方向。借助可视化分析这一工具,学者们能够发现我国情报学在21世纪的内在发展逻辑、发展时代背景、演进动因、知识来源、知识结构和演进路径、研究主题、发展主线、发展特征和规律,能够找到其研究的局限性。通过掌握学科研究重点,提供大量权威研究信息,以便学者找准研究方向、为其制定战略、有效分配关键课题的科研基金。

6. 情报学的发展离不开科研合作。在“大科学”“大数据”时代下,学者的研究合作已越来越倾向于网络优选。通过网络,研究者的合作对象、合作模式将得到优化。这种方式不仅大大降低了研究成本、减轻研究难度,还增加了科研产出量、扩大学术影响范围。

7. 要了解一门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有效促进学科发展,需要掌握其发展历程、发展特点、发展规律等。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图谱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图书情报学研究,还可以创新其他学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全球化逐渐加深、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利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提高我国知识体系创新能力,有助于中国占领科研制高点,营造全社会创新知识体系的良好氛围。

以往的研究经验表明,要正确掌握情报图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更好地为其制定发展战略,进一步推动中国情报学走向国际,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研究方法。定性研究通过发掘问题、理解事件现象、分析人类的行为与观点以及回答提问来获取敏锐的洞察力，而定量研究则以科学的数据、严谨的逻辑进行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互完美地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与缺陷。

第二节 中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

图书情报学作为一门归纳与总结规律的交叉性学科，吸收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部分理论。它不仅能够展现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发现时代中的关键人物、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下发现规律，还能帮助研究者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历史，提高学者的研究素养，培养其历史和理论思维习惯。正所谓“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要了解一门学科，必须要知道它的来源，并以历史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其发展历程。

一、中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

图书馆这一概念由西方进入中国始于 20 世纪初，其在中国得以成型则依赖于“新图书馆”运动的发起。1917 年，“图书馆学”一词首次出现在国内的文献中。1920 年，拥有美国国籍的韦棣华和沈祖荣在武昌创办了文华大学图书科，自此近代图书馆学正式诞生了。之后，一批有关图书馆学的专著和期刊在国内得以出版，图书馆学以一门专业学科在一些高等院校得以建立起来。20 世纪 30 年代，即将形成的图书馆学研究因战乱而未能成型。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图书馆学的相关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 世纪 50 年代，介绍列宁和毛泽东等关于图书馆事业的论述大规模出现。1956 年，首届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在南京举办，引发了国内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热潮。针对图书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讨论全面展开，致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从描述技术方法逐渐转向建构学科理论框架的方法。这一时期“五要素说”和“矛盾说”是理论研究的代表。1966—1976 年，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再次被中断，相关研究理论基础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单一、经验描述、批判性强的特征。1978 年后，人们开始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直观描述式的研究方法，迫切要求变革和深化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一批青年学者在吸收了国外先进理论和经验方法之后，以社会交流为方向对图书馆学进行研究，提出了情报交流说理论、知识交流说理论和文献信息交流说理论。我国图书

馆学研究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经验图书馆学被图书馆理论变革彻底瓦解了,现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得以确立。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逐渐转向了宏观现实问题,对图书馆学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在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后,不断深入基础理论研究,重新建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者们还对国外图书馆学研究高度重视,借鉴他人的优秀成果,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时期,信息技术管理发展向全面综合信息资源管理的转变迅速渗透到了图书馆学的各个领域,全新的信息观念随之确立起来。

进入21世纪后,自动化技术发展迅速,数字网络时代来临,我国图书情报事业在思想层面和信息技术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思想层面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图书馆性质、图书馆办馆理念、图书馆办馆模式以及图书馆组织管理方式等,人们开始加强对知识管理的认识。技术层面发生的变化则表现为产业技术更加先进、事业覆盖面更广、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研究使用的方便程度有所提高。

情报学是一门新鲜学科,它起源于文献学、形成于二战以后,传入中国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1956年,科学情报研究所在中科院成立,研究人员通过对国外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在这一时期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情报服务多样化理论,科技情报事业体制在中国得以建立起来。召开于1958年的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具有综合性、战略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该会议结束后,情报述评和分析开始出现在情报学研究中,中国特色的情报研究工作逐渐形成。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计算机技术日益成熟,情报学开始以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及其处理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此期间,情报学处于停顿状态。这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国内情报学研究的恢复时期大约是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其间掀起了两次高潮,一是信息技术的引进和应用,二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前者使我国的情报学研究重点和关注领域从理论向应用推进、从文献向技术推进,也由此带动了计算机汉字切分、自动标引、编制主题表、应用和研究等方面的发展。

而后者为情报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同时,我们开始逐步探究关于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的专业知识,其中包含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并开始研究和讨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情报学研究和科技情报事业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一些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也开始重视起来,如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的成立,1982年《情报学报》

的成立。改革开放以后，十几所高等院校设立了情报学方面的专业，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这个专业不仅培养出一批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还编著了一系列高学术研究水平的教材和专著，如《情报学概论》《科技情报工作概论》《情报学》等。现今，科技情报所不仅与国内大专院校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还与国外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国内获得更为专业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汲取国外的研究精华，进一步推动其发展。

我国情报学发展的转折期是在 1990—1999 年期间。随着信息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情报学抓住了合适的契机，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学科研究范围逐步扩展和研究深度逐步加深，它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报”传递，而是延伸到“信息”的领域；它能够与一些相关的学科匹配，从而兴起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在此期间，伴随着新兴领域的兴起，萌生了关于情报学学科根本属性、定位、性质、名称及其相关联学科（如信息管理、信息科学）的探讨。这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和自身发展的规律两方面所致。

2000 年至今，知识经济和网络技术给当今的信息环境带来了重大改变。在多媒体集成、数字化、互联网等信息资源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情报学发生了重要转变，更加趋向于虚拟化、网络化、数字化，在深度和广度上获得了更长远的进展。21 世纪，情报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献作品，主要集中在情报学认知观、定量化、内容开发、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知识情报学等领域。

情报学和图书馆学尽管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但是它们仍存在相同点和结合点。自 1978 年以来，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图情一体化”，这是图书情报事业走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它不仅单方面对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且推动了整个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发展。1990 年以后，传统图书馆学一步步向情报学靠拢，网络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在此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加快了两个学科的融合进程，也让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出现由“图情一体化”向“信息功能唯一论”迈进的新倾向。

很多学者对我国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曾进行过多方面的回顾和反思。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图书情报学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也不能单纯地认为我国图书情报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纯粹的西学东渐和中西方文化碰撞、结合的结果，其中还有许许多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由吴仲强等人编写的《中国图书馆学史》，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图书馆学

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本书主要介绍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回顾和总结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研究影响图书馆学产生和发展的主客观因素，三是了解中国图书馆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以及地位，四是对其代表人物进行客观的评价。

198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十周年，特别编辑、出版《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1949—1989年），共十集。这部丛书从十个主要方面全面总结了我国图书情报学四十年来的重要成就，这十个方面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文献学、基本理论、文献资源建设与布局、图书情报事业的组织与管理、情报检索语言、文献编目、读者学与读者服务工作、情报检索、图书情报事业发展战略、图书情报建筑设备与现代化技术。其中，还有很多人做出过贡献，如对我国图书馆学历史积极撰文的霍国庆、王子舟、刘亦平、戴煌滨等，对图书馆学某一分支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研究的龚怡首、王素琴、王友富、刘延章等。

运用大量篇幅讲述有关图书馆学史问题的著作还有《图书馆学导论》《图书馆学原理》《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它们分别是由黄宗忠、宓浩、倪波主编的。

1990年以后，图书情报发展史受到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业内学者开始重视图书情报发展史并进行更深入的关注和探究，他们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是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21世纪初，把图书馆学史列为重点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发布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的方式。此课题指南具有高度的认识价值，明确表示图书情报学史的研究不仅能够科学地揭示其发展历史、现状、特点、经验、教育、水平，而且还能够预判未来趋势。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关于图书情报发展史的重要文献：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年）——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它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以系统、全面、简洁的方式描绘的，自1978年来情报学与文献学研究发展、图书馆学的基本脉络和总体进程，是由知名学者张久珍、王余光等人完成的。此文献以学术发展为主要引导，全面科学地概括了本学科框架内学术发展的重要事件、标志性成果及理论、技术和方法创新等。②《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丛》，此文献是由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编写的，同时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担任学术顾问，一共二十卷。该文献主要讲述了图书馆、信息组织与检索、情报与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研究、信息资源管理、文献编纂与出版、数字图书馆和信息系统工程、信息资源建设与信息服务等一系列的内容。随着图书情报学的新发展，还出现了两